

走向世界—— 晚清帝國命運的一種新解讀

吳翎君*

罹患漸凍人症離世的史學家東尼·賈德（Tony Judt, 1948-2010）在他的病中回憶錄中，曾說：「我們不過是用歷史的例子進行教學的哲學家。」身為教學者的我，常反躬自省如何選擇「歷史的例子」成為「教學的哲學家」。在電子資訊與人工智慧迅速發展、知識生產與傳播節奏劇變的世代，要在講堂上達成這樣的任務已愈來愈顯得陳義過高，但從事大學人文工作教學者多少都要帶著這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使命感。如何在「通俗」與「不媚俗」之間取得分寸，並兼顧學術價值與創新觀點，以淺顯而不失深度的方式呈現給一般讀者，乃至於大學課堂中的學習者，已成為當下教學者和史學書寫的重要課題。

筆者兩年前因緣際會，完成了一本重新解讀晚清帝國命運的專書《跨國交織下的帝國命運——近代史》（聯經，2024）。在這次連結學院內外的書寫經驗之後，更加深刻體會到：人文學者固然應以撰寫紮實嚴謹的研究專書為職志，但同時，也應致力於發展另一種能夠跨越象牙塔的書寫形式，將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可被社會大眾理解的知識。長期以來，社會大眾對晚清歷史的認識，多停留在「不平等條約」、「貪汙腐敗」、「喪權辱國」等刻板印象。這類敘事一方面源於過去國共兩黨各自建構的革命史觀，另一方面也透過兩岸清史影視作品的反覆再現，被不斷「植入」大眾的歷史意識之中。事實上，臺灣近三十年來對近代中國史的研究已有很大的進展，一本全新的中國近代史，應有必要由臺灣學者來重新詮釋，以反映臺灣學術界的開放進步觀點。此處所分享的，是筆者對於在近代世界史脈絡中書寫「中國」的一種宏觀思考：為何晚清帝國應被理解為一個在「跨國交織」之下形成與變化的歷史存在。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中國進入近代世界秩序的特殊性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與以前歷史最大的不同，應是進入所謂真正意義的世界史——中國在政治、經濟、市場活動，以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和歐美為主導的全球擴張，產生了大規模的聯結和交會。雖然歷史悠久的「中國」歷代王朝與世界的交往早已有之，但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與世界聯結的紐帶和工具，大不同於以往。工業革命爆發百年後的全球傳播效應逐漸開展，交通運輸工具的進步、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電報和無線電訊的發明等等，這些效應使得全球金融市場和資本的流動較以往更為緊密，各國商人、技術專家、外交官、傳教士、醫生和勞力等等，他們在跨國或跨區域港口流動奔波，全球由此捲入史無前例的人（人群）、物品、技術等物質文化交流之大潮，同時也帶來不同文明之間的沖擊和碰撞。這些變化又伴隨著歐美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完成，角逐海外殖民地所帶來的龐大的經濟利益，並由此強化歐美民族國家的榮耀和財富（日本於明治維新之後亦加入帝國主義列車）；而挾著工業革命後之科技進步裝備，近代國家間的海上霸權爭奪比起任何以往的時代都更為慘烈，它對歐洲帝國及其海外殖民地都帶來雙邊及全球性的影響。

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大規模海外擴張及其對美、非和亞洲的侵略結果，有些論著宣稱中國是所謂「半殖民地」。筆者認為不能忽略的是清末帝國政權始終保有它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而且不停地進行自我探索何去何從；儘管清帝國面臨內外的騷動不安，但從推動自強運動以來，變革或改革以適應新局，始終是清帝國維持其國祚的主要思考，直到它被共和政權所取代。然而共和肇建後的民初中國仍舊是一個動盪政局的延續，無法建立一個具有現代意義之國家應有的憲政建制，根本性因素都來自中國本身的國家治理（national governance）問題。國家治理包含內部導向和外部導向兩部分，以及兩者之間的邏輯性；我們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清末歷史的演變，可以看到許多國家治理的內外問題，從清末到民初始終反覆存在，無法提出有效的解決藥石。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從裡到外的各種變遷和演化因素已是相互糾纏或相互推進，難以切割。晚清帝國所面臨之內外危機——尤其中國與世界在各種範圍和深度的接觸及其與中國內在聯繫的問題，這是過去帝制王朝所不曾出現的危機，所需的應對策略與能力也超越了大清帝國的國家機制和知識倉庫，而將整個國家與社會推向災難局勢的臨爆點。內部治理問題不僅祇有探討晚清時期，還有承續自清帝國建立以後所積累的觀念、制度和文化；而外部導向則牽涉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面臨世界的大變局，前者涉及之歷史傳統的複雜

性並非一本晚清史的專書所能涵括。如同著名漢學家孔復禮（Philip A. Kuhn, 1933-2016）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一書所揭示的清末帝國「其實是一種制度——一種已經無法同自身政治使命和任務相契合的制度——的沒落」。它所觸及到的不僅是大清王朝本身的統治機制，而且是中國整個帝制制度及前現代國家的「國本」之所在。但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正是由於危機根源所包含的超越中國帝制時代的性質，這又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歷史起始點。

近代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十九世紀歐洲國家在全球征服的過程中，相對於它們在非洲和美洲建立各自統領的殖民地，在中國採取的主要是聯手合作的戰爭，例如兩次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等（當然帝國主義者的貪婪和彼此的勾心鬥角，合作中的猜忌和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中英之間不得不走向一場鴉片戰爭，而其後又有兩次英法聯軍、日本維新後對中國的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等戰役，使得近代中國予人的感覺就是一場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不斷的戰爭。事實上，晚清時期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戰爭，不論就戰爭持續時間、動員兵力、交戰地點和規模都不大，它不是焦土性的侵略戰爭，也沒有造成大量無辜人民的傷亡。反而是十九世紀中葉一場大規模的太平天國內戰，清王朝對政權的保衛戰和太平軍的攻城掠地，彼此激烈的交相殘殺，造成數以百萬的士兵和無辜人民的死傷悲劇。同時，也更多是由於中國內部的動亂和農村生活之艱困不易，使得十九世紀後期中國的海外移民進入新一波的高峰。

二、跨國技術和知識在中國的全球聯結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在全球史中的意義展現出高度的特殊性。這一擁有悠久歷史與文化傳統的東方帝國，如何步入國際體系並融入全球化進程，不僅深刻改變了亞洲既有秩序，也使中國在被動與主動交織之中參與世界，進而開啟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進程。雖然明清之際已有耶穌會士來華，服務朝廷並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但其性質與清末自強運動時期的西方參與者顯然不同。自強運動期間，來華的「洋顧問」多為工業革命後形成的專業技術人才，如具海軍經驗或工程背景者，受清政府高薪延聘，參與軍事與工業建設。傳教士則持續活躍於教育、翻譯、外交與醫療領域，但其傳教策略與活動範圍，較前期更為深入且廣泛。隨著條約體制的確立與內地傳教的開放，來華傳教士人數顯著增加，並透過醫療救助與教會學校拓展影響力。同時，在通商口岸與租界中，亦出現工程師、律師、會計師及專業醫師等新興職業群體。這些西方人士未必皆

為帝國擴張的代理人，卻在中國融入世界的過程中，扮演了技術引介、制度轉譯與知識傳播的關鍵角色。

過去的歷史研究強調帝國主義在殖民擴張，以及直接塑造了殖民主義的手段和工具；即蒸汽機、火槍與海底電纜的發明和普遍應用使之向海外擴張的動機，能夠順利地付諸於實施，以最少人力和資金投入就可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軍事征服、殖民開發與資源掠奪。近年來在有關帝國與殖民的歷史研究，已有諸多學者對帝國的歷史提出反省和批判，一些著作強調去殖民化的本土觀點，認為儘管大多數現代技術是在西方被發明，但當它們出現在非西方世界之後，當地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自然而然地會對這些技術產生影響，以使它們更加適應在地的情境。因此，技術在非西方世界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並被重新詮釋於本土化的脈絡中。不僅技術流通如此，對西方思想文化或物質文化如何向非西方世界的「擴散」，近年來也有諸多研究更強調異國文物的本土化或在地化轉譯的脈絡。在地化的技術、物質、思想與當地社會之間的互動催生出了新的文化範式、身分認同、社群組織，以及對政府治理的新挑戰等等。因此，近代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是多層次，在各個層次間相互滲透，最終影響了國家如何面對這一全面劇變的治理方針。

三、何謂「中國」？作為概念的中國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跨國之間的交往愈趨頻繁，一些商人、技術人群、傳教士、勞工、移民等，不論移出或進入，這些群體開始建立了跨國紐帶和新異事物的交換，逐步改變了近代中國與世界的交往面貌，以至於今，全球範圍內的跨國移動和國際文化交流已非常密切，我們已經很難完全用民族國家的敘事框架來討論跨國史和全球史的議題。然而，這並不是意味著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並不存在，處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我們一方面可以清楚意識到國家或民族作為區分身分的認同，以及當下國際危機的一觸即發，國家邊界和敵我意識的劃分無所不在，但作為歷史研究的議題，我們面對的是過去的現象，是否可能有更大的超越性，史學研究是否能多從全球一體的歷史的視角重新梳理民族國家之間的歷史，如果能抱持這樣的襟懷，那麼我們探討近代中國史予以全球意義或許便可由此浮現。

1911年專制王朝終被推倒後，民初政治仍在帝制復辟陰影和嘗試國會政治的混亂中尋找出路。到了1920年代，一些中國知識分子進一步意識到中國不僅需要富和強，還需要兩位「先生」的扶持：「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

(Science)。「富」、「強」、「德」、「賽」構成了五四以來理想「新中國」的重要成分。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政治翻滾和時移事遷，當代中國終於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富和強，然而「德」先生和「賽」先生仍遲遲未到，「德」先生更遠遠落後於「賽」先生。中國對當代世界所呈現的最大挑戰和威脅，正是一個國家是否可以排除「德」，徑直完成「富」、「強」、「賽」，使人民在享受這三項好處的時候，不必再追求「德」先生？！

近年來，歷史學界熱烈討論「何謂中國」的問題。本文無法詳述其複雜脈絡，但可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新興民族國家的出現，去殖民化與國族記憶成為研究重點；至 1990 年代東歐共產體系瓦解後，圍繞列寧式政權的國族衝突，更掀起新一波討論。然而，相較多數國家仍能維持相對穩定的國家認同，「中國」與「中國人」的概念卻在跨地域間呈現顯著差異，甚至逐漸逼近難以回返的臨界點 (point of no return)。此一現象促使學者追問其歷史根源。就近代中國而言，現代國家的制度建構與內外治理始終充滿張力；若追溯其源，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歷史經驗尤為關鍵。從經濟、政治與思想文化的變遷觀之，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不僅形塑其自身發展，也影響全球對現代性的理解。因而，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對於思考「作為概念的中國」及其世界意義，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